吟唱不被生死阻断的亲切过往

□明前茶



《落在我身上的雨》
陆庆屹 著
新星出版社
2026年8月

“喜欢上了雨点与我之间的缘分，它经过那么漫长的行程，也许就是为了落在我身上。”

《落在我身上的雨》，是独立电影制作人陆庆屹推出的长篇散文集，被读者誉为文字版的《四个春天》。这次，他放下摄像机，拿起笔，以“六个乐章”记录温暖悠长的家庭故事，追忆家人之间含蓄又浓烈的感情，以及不会被生死阻断的亲切过往。

在这本新书中，陆庆屹犹如一名编曲家，编织了复调与和声织体，吟唱年少的依恋、成长的阵痛、永恒的失去，以及那些改写命运的偶然与惊奇。

作为《四个春天》的观众，我之前并不知道陆庆屹的成长旅程异于常人。他少时是一个“问题少年”，15岁时打架、退学，离家出走，从南方流浪到北方。他曾住在“圆明园画家村”，他当过业余画家和足球运动员，当过酒吧主唱，从事广告设计，也当过编辑和摄影师，他甚至在一段时间的失业之后，当过几个月的矿工，试图以身体的疲惫来消解精神上的迷茫……

令我感动的是，陆家人最大限度地接纳了陆庆屹的迷茫与种种试错。在清华大学读书和教书的哥哥陆庆松，全力帮助他完成曲折跌宕的自我探索。父母更是张开苍老的双臂，为陆庆屹遮挡了所有的质疑。

陆庆屹失业那会儿，一直关在家中看书。为让儿子有机会出门走走，母亲特地派他去喊父亲从修理门市回来吃饭，父子俩因此有机会一趟又一趟地相伴往返。父亲没有问儿子未来的打算，没有给他压力，没有催他到外面去奋斗，相反，父亲提到，他在读陆庆屹早年写的诗，想从中了解，儿子都经历了什么，“他脸上出现了难过的神色，问我是否真的痛苦到灵魂深处的程度。”“他想紧紧地拥抱我的心。”

而在1999年冬，在矿山工作几个月后，陆庆屹回家过元旦，不巧，火灾令新建不久的房子满目疮痍，父母收藏的珍藏照片、信件、录像带，甚至母亲的日记本、父亲的乐器，被烧毁大半。大火扑灭后，楼下传来“祝你生日快乐”的琴声，陆庆屹猛然记起，那天正好是他的生日。在生日歌之后，父亲还郑重地拉起他最爱的曲子《沉思》，因为小提琴的背板已被大火烤焦，残破的声音在天井四壁里回旋，做儿子的听得“魂魄都飞了起来，心中又悲又喜”。这个独一无二的特写镜头，精确描摹了父亲豁达的精神世界，以及他在逆境中对家人的体察与安慰。

这一家人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在命运的跌宕中，依旧不忘关切家人是否“过上了理想的生活”，依旧能觉察，享受幸福的罅隙究竟在哪里。

本书从《回忆父亲》起始，到《回忆母亲》终结，首尾两章，陆庆屹倾注了全部的情感，通过纪录片一样的长镜头，去凝望父母的生活，忠实而朴素地勾勒出父母的豁达。父亲陆运坤80多岁了还在对着电脑，孜孜不倦地学习视频剪辑。与内向的父亲相比，母亲李桂贤有着小太阳一般的人格，她清亮的笑声与歌声，总是像一群又一群的小鱼儿，跟着她，穿梭在家里的每个角落。

母亲在麻尾图书站当图书管理员的身影，是本书中最动人的身影。母亲只有初中毕业，但一生酷爱读书，她省吃俭用，订阅了大量文学杂志，还在1976年3月，买过一本叫做《写作》的书，因此，她主动考上了图书站的管理员。老家发洪水时，为了抢救泡在洪水中的书籍，母亲与大舅还有几个邻居，在水势缓下来时，推着竹筐，游进图书站，把漂着的书捞回。陆庆屹回家时，发现家中晒满了书，“书桌、椅子、竹篾上，到处摊着一本本发胀的书……书页像扇面一样敞开，香气就是从那里面散发出来的。”

摩挲着母亲在扉页上留下的字迹，陆庆屹内心震动，仿佛找到一把解读母亲心态的钥匙。是的，父母这一生非常坎坷，大女儿因病早逝，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借债盖好的小楼突遇火灾；小儿子一直漂泊谋生，大儿子为了照顾弟弟，也辞去了清华的教职……但母亲从未怨天尤人，她以书中的开阔思想与豁达天性共同筑起了一道墙，最大限度屏蔽了生活中那些无奈和痛楚。

要向前看，要坚信这个春天过去了，会有下一个春天。这是父母教给陆庆屹兄弟的道理。

在陆庆屹的故乡，贵州独山的溪流汇成大河，流入海洋，它并没有消失，而是蒸发后回到天空，再凝结成雨水，落在远方的人身上。爱就像雨点一样，唤醒麻痹的灵魂，让人感受到，“一些坚定的力量”突然回到了我们身上。

菜市场是张“关系网”

□林颐



《中国菜市场》
钟淑如 著
光启书局
2026年7月

超市连锁遍地，电商买菜普及，预制菜风靡当下，如今的菜市场似乎成了略显陈旧的市井符号，是我们熟悉的也是容易忽视的生活角落。

人类学者钟淑如却敏锐地感知到了“中国菜市场”所蕴藏的社会规则、城市脉络与人间真谛。她历时十年，踏遍五十余座城市、两百余个菜场，从海南鲜活鱼市到新疆热闹大巴扎，以扎实的田野调查、严肃的学术视角与温柔的人文体察，以“在场者”的姿态沉浸式观察，甚至化身鱼摊帮工以融入市场日常，在朝夕相处的调研中，捕捉市井江湖的冷暖百态、行业经营的生存智慧，写就了《中国菜市场》一书。

该书的优点正在于其“鲜活”，作者勾勒了菜市场运转的真实常态，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尤其女性的命运故事。作者以温情的笔触描绘了菜市场的存在之于中国人的意义。菜市场是一座城市缺少的人情味自留地和社区联结空间。这里有摊主与顾客的熟稔寒暄、经验分享，有同行之间既竞争又互助的日常温情，有四方食材流转、八方人群汇聚的烟火交融。在这里，人们触摸食材的原生状态，感知四季更迭的自然韵律，交流烹饪的心得经验，让被现代生活割裂的人与食物、人与自然、人与社区的关系，重新得到联结。

关系，正是全书的核心要旨。作者指出，在菜市场，每一笔交易，都是“关系”的建构。摊贩们依靠“强关系”维持生存，他们与供货商、码头船老大之间有着基于地缘、亲缘和长期交往的信任链条；而消费者与摊贩之间则通过日常的寒暄、抹零、留好货等互动，编织出维系市场活动的“弱关系”。这种“强关系支撑生存，弱关系维系活力”的生态，是任何冰冷算法都无法计算和替代的人情壁垒，也是中国菜市场没有被超市体系淘汰、没有像现代西方国家那样退出主流食物供应体系的关键所在。

钟淑如的“关系主义”视角，揭示了隐藏在菜市场背后被遮蔽的图景。在超市，消费者通过视觉、触觉、味觉的综合判断，以及摊贩基于声誉的“精挑细选”来熟悉食物质量。在菜场，摊贩熟悉当季食材，了解街坊口味，构建起超越买卖关系的信任网络。我们无需与摊贩成为知交，但这种弥散性的弱联系，让社区时刻充满温度。中国菜市场是一所包容万象的生活学校，是抵御快餐化、碎片化现代生活的温柔力量，蕴含着中国式慢节奏、深体验的东方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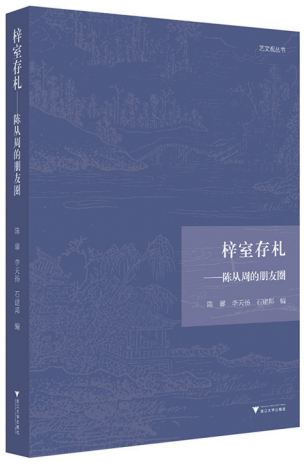
在工业化、标准化的现代商业体系冲击下，超市的规整高效、网购的便捷省心、预制菜的快捷便利，不断重建国人的消费观念，传统菜市场是否终将被时代淘汰？该书用鲜活的事例证明，菜市场不是简单的食材交易场所，它有着现代商业无法复刻的特殊价值和顽强生命力。不同于工业体系定义的标准化“生鲜”，菜市场的“新鲜”，是根植于土地、时令与地方水土的原生鲜活，是小农物产、地域风物的专属载体，是无法被冷链包装、批量复刻的自然滋味。中国人骨子里对“鲜”的执念，其实是农耕文明留下的基因，是我们拒绝食物变成冰冷商品的一道防线。逛菜市场，是我们掌握生活主动权的一种微小抵抗。

所以，菜市场不仅是一个由关系支撑的交易场所，它更是现代社会中一种能够不断生成和维系关系的基础设施。在这个意义上，保护菜市场，就是保护我们城市生活的多样性和韧性，就是保护那份在快节奏时代里，仍然愿意为了一口“鲜”而驻足的从容与自在。我们需要理解“关系主义”，重建现代食品体系中的地方性，让菜场成为有灵魂的社区生活空间，从而发现、理解并创造城市日常生活中的精彩。

该书的“关系主义”视角很有启发的思维，可惜的是，作者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对市场日常、摊贩生活的具象描写上，作者大概力有未逮，没有进一步深挖“关系”的逻辑规则，尤其规避了网络大平台等现代资本对于菜市场这类“原始”传统模式的打击与摧毁，以及机器大生产运转背后的制度性的力量对“关系”的重新定义和改造。全书给我的感觉是稍显扁平的、写作内容过于泛化的、主题仍需突出深化的，不能不说是有遗憾的。

清风明月照我还

□秦颖源



《梓室存札——陈从周的朋友圈》
陈馨、李天扬、石建邦 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6年7月

被视作“中国最后一代名士”的陈从周先生，是文人造园文化的继承者、总结者、传播者和践行者，首举将明计成之后的园冶之道和术接续入现代。《梓室存札》（下称《存札》）这部60余万字的厚册，收录的全部是133位友朋的765封来函，并无陈先生的去件，对于探视前辈甲子年华后文坛交游意义深远。

叶圣陶和俞平伯两位耆硕是陈从周交往最为密切的文坛书友，存札量远超他人，且二老晚年喜以邮代步，高频互函。如果把三边的文书按时间编排，可以发现陈从周在1973年前已和平翁相识，双方的笔谈肇始于交流干校生活，风雅名士“却能体验新生活，对农民有感情，为生平未有之经历”。三人鱼雁往来谈论最多的当是姑苏马医科巷曲园的修复，由此话及的故园旧貌、先人逸趣、诗文唱和。

《说园》（1978—1982）是陈著中知名度最高的，但细检《存札》会得出一个印象——《扬州园林》可能是陈先生最在意的学术作品。《扬州园林》源于1961年学生测绘，1964年编定，包括园林和旧住宅，陈先生在1961年8月写就《扬州园林与住宅》一文。这套扬州测绘成果从图纸到文字的量和质，相较苏州系列有明显提升，且调查全面彻底，把扬州老城内有价值的历史遗存大致收罗殆尽。

陈先生自1952年起任教同济到辞世，近半个世纪，但《存札》中和同济师生相关的屈指可数，同仁只吴景祥一札，弟子仅刘天华一札，不知是否因为近水观月的缘故，反令读者对陈先生文坛外的专业人设不甚了了，但其中收录的贝聿铭的55札却弥足珍贵。贝陈二人情谊笃深，世人皆知，来自陈先生多篇记述，而贝先生几乎从不公开发表文字，只谈不写，私交内情更是讳莫如深。这批从1979年香山饭店合作起到1994年相助陈女儿回国探亲的中英文原件（只有3封中文短简）可能是贝先生公开的数量最多的手稿，在贝陈知交外，展示贝大师的职场风云和海内外贝氏家族人脉。

陈先生在校园内有着“老夫子”之谓，似乎难与洋派为伍，但《存札》中与海外互动之频繁颠覆外人之锢见。“明轩”之后，陈先生招收日本研究生，应邀赴港讲学，接待过多位来访重要学者，其中有日本建筑史家田中淡、美国现代景观设计大师哈普林、费正清夫人费慰梅等，还有未曾谋面的耶鲁大学建筑系教授邬劲旅和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长柯普，最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代曾拜访陈先生的两位研究中国园林的英国女学者——凯瑟克和夏丽生，前者相赠英文专著《中国园林的历史，艺术和建筑》（1978），后者是《园冶》最早的英译者，当下西方研究中国古典园林文献的权威。在网络时代之前，陈先生已多次将自己的著作和古籍重刊主动寄赠海内外学术机构，包括台大，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陈先生相信最中国的也一定是世界的。

《存札》的两位主编筚路蓝缕，四年甄选解读，又四年增补出版，为保证史料的原真性和纯粹性，不负前辈，采取两项举措。其一是全文照录，除极个别人名隐讳外，不作文字删节编辑，这就为读者能够洞察原信人悄然深藏的人事臧否提供最真实的视角。

陈先生存札其实当远不止此公开数，这些不过是1970年代中后期复苏的人生晚唱，而前半生的积攒大多已被时代风云荡涤，两位授业导师朱启钤和梁思成的都片纸不存，极少数劫余幸免的散见在各处集藏。徐悲鸿1950年的2札现存，内提及徐志摩和张大千，《春苔集》收录的凌叔华谈徐志摩遗稿“八宝箱”下落的2札不知安在，另外《童寯文集》和《刘敦桢全集》中都有未见于《存札》的散件，这些珍贵的史料若能在重印时补入，修订致臻，充分展示陈先生一代名士风骨、学养和人格乃至中华古典精神的暮色绝唱，任凭后来者遐思无限。